

谈
蒋
经
国



一 如是我闻

昨日，小女（曹雷）从小学放学回来，带了许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说，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。她说，这是她们的老师告诉她们的！显然地，在小市民群中，蒋氏已变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了。我和蒋氏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：他在赣南做行政专员，我那时恰好移住赣州，看见了他的新政设施。我虽不必谬托知己，自以为了解他的社会观，但我有十二分自信，敢说那有声有色的传说都是不合事实，不可靠的！京中外籍记者说中国已经变成了内幕新闻的国家，再多的报纸也没人理会了。其实大半内幕新闻，同样地向壁虚构，绝不可信的。

蒋经国，他一心一意要做科学化的现代人。社会一般人士却要他回到古代去，做包公施公一些神奇的人物。蒋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，锻炼成熟，他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，一般人士要他穿上封建的外套，变成带上方宝剑的七省巡按。蒋氏自己要实践法治精神，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，一般人士却希望他先斩后奏，大权独揽……这都是顶有趣的对照，他自己已经走到时代的前头，大家拼命要把他拖回来，

这社会矛盾得多可笑！

里巷间最流行的是关于蒋氏便衣出巡，私自察访的传说。说他扮了卖馄饨的，破了一家大户的赌案。这传说差不多传了十来年，而且有中国人的行踪处，便有了这一传说。其实，并无其事，连影子也没有。假如，他要这样来破赌案，那就枉然在苏联过了十四年的大时代生活了。这一传说的流行，当然使他头痛，因为他要接近民众，“神秘性”反而使民众不敢去接近他了。

说到“微服”察访，所谓“微服”，究系哪一种打扮？现在官吏，并无固定的服制，所以说不上什么小衣小帽。市民心头，大概要蒋氏化装表演，才算痛快。蒋氏的服装，军服、中山装、长袍（不加马褂），都爱穿，穿得相当齐整，并不矫作怪僻的打扮。身材不高，穿长衫就没军服那么神气。不过，因为穿了长衫，倒和民众容易接近，他在街上走的时候，老百姓就敢于和他点头，围着他看了。

蒋氏击破土豪劣绅的顽强势力，用的什么法宝呢？说穿来，简单得很，他只设立一个民众问事处。每星期四，他亲自接见民众，听听民众肺腑中流出来的话。

读过《儒林外史》的，该记得那位严贡生，强留隔壁王家的猪，还把王大打了一个臭死。黄梦统误把借约留在严家，他强着他出大半年的利金，还把他的驴儿和米同梢袋短了家去。他白坐了船家的船，借题怒骂一阵，分文不给，他开口就是送到衙门里去，打几十板屁股再说。乡绅吓唬老百姓的办法，就是勾结衙门，为虎作伥。衙门八字开，只有他们进得去，县长在街上走，他们故意走在一起，和县长交谈，进城入衙，故意到科长秘书的公事房兜一转，甚至在号房坐一回出来，也可以骗骗那泥土气息的乡下人。（乡绅的主要职业，便是“把持官府，包揽词讼，广放私债，毒害良民”。）蒋经国首先把这



1940年3月蒋经国赴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赣南施政状况时的合影。蒋介石把赣南视为其施政的试验田。

墙壁拆掉，民众要和政府打交道，就直接到衙门来，用不着乡绅做中间人。民众不认得门路，那就到民众问事处去，有人在那儿替他们写公函撰诉状，指点法律的门径。有什么苦痛，也可以向蒋氏当面说去。这么一来，“狐假虎威”的绅士，倒失了他们的变戏法的本钱，拆穿西洋镜，给老百姓看不起了。蒋氏的县政府，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，这是他最大的成功。蒋氏就任以后，从不拜访豪绅，绅士去谒见他，也一律挡驾，三番四次碰了钉子，那些煊赫一时的大绅士，“虎落平阳被狗欺”了。

赣州有位绅士，洪甲第，那才是九九修炼的大狐狸。他的样儿，文绉绉地弱不禁风，像张良那么一种风度。他写得一手大字，也会做些诗词古文，够得上一个雅字。他是地方团队的首长，全城武力握在他的手里。走上街去，四个马弁，挂着盒子炮，好不威风。地方上的事，就靠他一句话。县长专员，还不是要等他的示下，他的命令就超过了省政府的命令。熊主席打电报给他，还不是照样的称兄道弟。蒋经国做了专员，只有一个月，就把他摔下来。他还非常机警，自动交出了地方武力，安分守己，一切都听蒋的话，他的声威，一天一天黑下去，一只老虎，很快地就变成了绵羊。到了第四年，他便悒郁以死了。蒋经国看准了力量在民众的本身，他自己和人民去接近，绅士只好退避三舍了！

二 鲜红的血

蒋经国曾经写一本书，题名《鲜红的血》，扉页上题词有云：“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，但血的颜色，却都是一样的。鲜红的血，永远是光明的象征。”说得混统一点，他可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！



青年时代的蒋经国

我曾读过一篇蒋氏哭王县长继春的文字（原题为《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》，曾载东南各报），一字一泪，含蕴着超过伦理关系的爱。有如慈父哭子，爱侣悼亡，契友折翼那么深挚，出之于肺腑的哀号！友人V兄，他和王县长有点私谊，那时候也在泰和。蒋氏痛哭王县长那一刻，他也在场。他说：“蒋氏嘶声啜泣，泪尽继之以血，骨肉之间，也不过如此！”泰和的朋友同情感叹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替蒋经国做事，死了也算有点意义，王继春可以瞑目了！”后来，我也找了另外一些材料，读到了他哭南康县长王复安，哭陈明光保长，悼周崇文干事的文字，我才懂得一点，所谓“同志之爱”，这是扩大了“手足之爱”的圈子，和“人类之爱”同一振辐的“大仁”。是从“封建思想”中解放出来的新的伦理关系。（各文均见蒋氏所著《鲜红的血》及《新事业》）

这一种泛人类的爱，推其原始，盖基于他对生命的了解，有如释迦证悟，油然而生普度众生之念。有一时期，蒋氏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度过饥寒的岁月。有一次，他病了，病得快要死了，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，有四个青年伙伴围绕着他。他们都知道他的病是非常危险的，大家都想医他救他，但是谁也没有办法。他们五人，都靠卖气力过活，那几天天气特别冷，找不到钱。他们只好同声唱他所喜欢的歌给他听。那一天晚上，门外风声特别大，地上冰发出格格の裂声。他听听门外风声，看看地上的油灯，望望朋友的愁容，想想自己的命运，感觉到死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。又有一天，他在工厂里遇到了小彼得（那四个朋友中之一），两人在一起玩，在一起吃，一起工作读书，情同骨肉。有一天，厂内起了火，小彼得很勇敢地跑到火焰里去抢救器材，抢了出来又回进去，但是第三次进去以后，再没有看见他出来了，他烧死在里面了。火还没有完全熄灭，蒋氏就跑到火

堆里去找他叫他，后来找到他的尸体，他便亲自挖土，把他埋葬在一处松柏林里面。他那时对于死，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蒋氏曾经用一句反诘的话来提醒世人：“你可知道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？”他自己说：“十四个年头在国外的流浪，奔走，求生，使我认识了什么是悲痛，什么是幸福！最近五年来，在工作的斗争中，亲眼看见祖国新事业的成长，及无数同胞及知己友好的死亡，更使我认识了什么是苦难，什么是甜蜜，什么是生存的意义，什么是人生的真理，使我明白了人类生死的价值。”他对于生命，有了积极的看法，“倘使有人认为人生就是梦，那么也应当做一个快乐的高兴的、甜蜜的梦；假使说人生是戏，那么也应当演成一出有声有色、庄严隆重的大剧。一个人可以做无名英雄，但是绝对不要鄙视自己看轻自己，不要把自己变成寄生虫，活一下就毁灭了！”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青年，他已悟得如此的生命意义，“生就是死的否定，死也就是生的否定；没有生就没有死，没有死也就没有生，当一个人刚出世的时候，‘死’状已经获得存在，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，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。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，像古人说的，‘大哉死乎！’但是我们应当了解，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，我们应当知生死的意义，生和死的统一。”

三 苏联怎样教育了他

对于这一位青年政治家，他在苏联所受的教育，可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到苏联去那年，还只有十四岁，在苏联度过了悠长的十四年。他回到了国门，屈指自己算一算，能写的中国字，还不满一百个；在他的身边，是一位苏联女青年，和两个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娇儿。

从一方面看，他是“苏联型”的，他不仅用俄语作第二国语，而且他的社会观人生观，也是那么极端，一反东方的中庸之道。从另一方面看，他依然是中国的儿子，他那奔放的滔滔不绝的辩才，依然脱不了宁波的语调，仅仅比他的父亲高明了一分。他个人生活复归于宁波式，自不待言，连那位冠着东方姓氏的方良女士，也说着宁波话吃着宁波菜，看不出是在苏联工厂火炉炼出来的钢铁。许多美国记者很注意到这点，有人当面问他：“当你回到祖国来，史太林（今译斯大林）送你一枝手枪，他是怎么对你说的？他是不是说：用这枝手枪保卫着你的政治信念吗？”这又是一个“卖馄饨”型的西方传说，也是不可信的，但，他无论如何逃不了苏联所受教育的影响。

他初到苏联那一时期，正当苏联内战初停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之际。但是，这个百孔千疮的苏联，就在他的眼前苏生过来。1925—1926年，他在孙逸仙大学所受的是政治教育，1927年以后，他又参加了红军，受了三年多的军事教育，1931年以后，他便参加了工厂的生产工作，那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。到了1933年，他已是工厂中的技术师，接着参加了第二次五年计划。1936年，他做了报馆主笔，那是一份和工厂有直接关系的报纸。1937年3月间，他要回国来了，他是从莫斯科动身的。他亲身呼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春气息。但是，他所受的精神训练，比清教徒还清苦些，大部分都嚼着那冷而硬的黑面包，和着冰冷的自来水。他的手，几乎有四个年头没碰到过肥皂，只是在细沙中磨擦。在滴水成冰的水门汀上，他裹着仅有的毛毯度夜，打颤地抬头看那黯淡的寒月。当他在乌拉山野外演习的时候，却又白昼在百十六度的火炙沙地上往来，晚上突又陷入零下七度的冰窖中。经过这样的严格的生活锻炼，因此，他已能适应着各种气候变化。他能长途跋涉山谷，每天五六十公里，经十天半月而不

疲，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体格。烈性的伏特加酒，伴着他度过漫漫的冬天。因此，他能连喝数十碗高粱酒而不醉。他会驾驶种种现代的交通工具。有一晚，他已经喝了过量的高粱，依然驾驶了汽车，从临川直驶南昌，并没出什么乱子。我们该知道当他在北国受苦受难锻炼筋骨之时，正当蒋委员长勋业盛隆，如日中天之年。他何以舍此而就彼，甘于那么受苦呢？这对于造成一个坚强的意志有着最大的决定性，他最懂得史太林所引的那句俄谚：“最后一个笑的，才是真正的笑！”他常常说：“我们中国，真不够吃苦！”

苏联的社会经济，还不如我们中国，那是大家所知道的。古老的俄国农村生产的落后，也和我们中国相伯仲的。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突飞猛进，二十年之中，成为一个和美国并驾的工业国，这件事，对于热力蓬勃的青年是富有启示性的。何况他自己并非是旁观客，而且亲身参加，分享着成功的光荣的。苏联可以成功，那么古老的社会可以新生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新生？不能同样成功呢？这一课题，自必时常浮在他的脑际的！

他知道苏联的成功，全在于他们的韧性，他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的决心。他眼见多少老年人在大饥荒中倒下去，但是他们留着仅有的牛乳给下一代的婴儿吃。他眼见每一苏联人，上自主席加里宁——下至工厂的伙友，一齐束紧肚皮嚼黑面包，却把大部分农产物输出国外，向美国交换工业中必需的机械。天下决无成功的捷径，他要大家效法苏联人的吃苦精神。有一回，他说：“天下是没有不能忍受的痛苦，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业，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，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。但是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，要做一个群众的英雄！”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苏联的评语。

四 如此赣南

有了蒋“总统”这样的父亲，该说是最好的政治资本。但对于蒋经国，也可以说是不合算的。别人一提到了他，便说到这一份政治资本。他有了什么政治计划，做了什么成绩，便得打很大的折扣。以蒋主席为父，行得通，做得好，就没有什么稀罕了！照当时泰和人士的口吻：“新赣南应该做得好的，只要他伸出手来，中央还怕不给钱吗？”等到他们在赣州的平坦大道上漫步，他们已经忘记旧赣南是怎么一种景况了！

熊主席（式辉）把蒋氏放在第四区专员的位置上去，那时的赣南，依然是江西的化外之地。军事上的势力，和广东方面比较亲近。封建性的地方团队，各自为王。蒋氏前一任那位行政专员，是给一个地方团队的军官用手枪抵着胸口吓下来的。赣县的县长，给绅士轰下来了，他们便径自推举了主席委员，不问省政府的政令，便即日接篆视事了。那个靠了钨矿来繁荣的赣州，大赌场足与澳门媲美，坛子巷那条莺莺燕燕的长巷，笙歌喧天，日以继夜。赣县有多少烟民，我手边虽没有统计材料，单说南康那一小县，就有二万人吃鸦片；赣南十一县，平均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吃大烟，可以编成十个师的烟枪队。至于土匪之多，可以用着“如毛”的形容词。偏远的城镇，几乎是民匪不分，民不依匪，亦无以自存。崇义的文英墟，那区署有一次打死了一个土匪，那一个大市镇，便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。各地土豪筑堡自固，“天大地大，除了蒋委员长便是他大”，各地皆然，例不胜数。民国二十八年，蒋经国便进入了这样的“赣南国”。在省政府束手无策之际，熊主席姑且让他去试试看的。

也和蒋氏到上海来督导的情形相同，当时，他也很快被带了“蒋

青天”的纸糊帽子。但他的政治改革，也并没获得农民群众的谅解与支持。有一天，他和上犹县长王继春一同走出了建春门，经过东门浮桥，向郊外走去，在梅林附近一处茶亭中坐下吃茶。其时，在他们对面的桌子旁边，坐下来了一个刚刚放下担子的挑夫，那人揩汗坐下来，便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，米一天一天地贵起来，我们都会饿死了。”旁边便有一个种田人接下去说：“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，我们赣州人都会饿死了，我们自己的饭都弄不到来吃，而他还要去挖什么保塘，修什么电话！”那挑夫得到了同调，便接下去说：“昨天，保长要我的儿子去读书，说不去上学堂，还要罚钱，说这是蒋经国的命令，不听命令就会倒霉！”那种田的气愤地接着说：“我们赣州人的儿子，又不是蒋经国的儿子，他们自己的儿子有钱去读书就好了，我们的儿子为什么又要蒋经国来管呢？”茶亭中的舆论，此呼彼应，其中有一个说：“我们赣州人有了一个蒋经国真倒霉，他来的第二天，日本飞机就来炸了，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虫吃光了，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，我们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好！”这些话，一句句刺进他们的耳边来。那时，王县长用南昌口音问他们：“你们说的蒋经国是谁呀？”那茶亭老板便讪笑着道：“老表，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样有名的蒋经国吗？”其时，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人，非常气愤地来插嘴道：“听说蒋经国还不到三十岁，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，他都要来管，天下哪有不乱之理？”又有一个年轻的说：“蒋经国叫我们要吃苦，现在吃苦，将来享福，哼！等他给我们享福的时候，恐怕大家的子孙也会死光了。只要蒋经国走了，我们就太平无事了，做百姓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！装电话、修马路、造学堂，那都是洋人做的事，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。”……这种种，都是郑子产为相初三年的情况，老百姓们说：“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！”

如此赣南，蒋经国初入这个化外之区，并非一帆风顺。他面对着的敌人：土豪、劣绅、恶霸、土匪、娼妓、鸦片鬼、赌棍、流氓……还不够，连他所日夜计划，替他们谋利益的“老百姓”，也在诅咒他。有一时期，他不得不考虑着：“我们要不要干下去？”

五 新赣南如此

民国三十四年春天，笔者和一位从赣州流亡到南城的邮务员相处。他对我忽然说了一句心腹中流露出来的话：“我们离开了赣南，才知道新赣南的可爱。”他又说：“走到无论哪里，总是乌烟瘴气的，不像个城市。想起了赣州，那么干干净净的，过的是像像样样的生活。”真所谓“不上高山，不见平地”，这倒像是子产为政三年以后的舆论，民众眼中，已经有个是是非非的真正交待了。

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间，蒋经国从重庆归赣，偕来的有美国记者福尔门，和《桂林大公报》、《广西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的几位记者。其时，福氏刚从河南前线归渝，他对政府的豫灾救济非常不满，蒋委员长便让他来看看赣南的新政。这位绝望于中国前途的友邦记者，到了赣州嗅到了怎样一种气息呢？他到了新人学校，和自由自在的囚犯谈了好久（这是判了刑的囚犯受教育的所在）。也到了强民工厂，这是无业游民的技术训练所，看过一个小瘪三出身的乐队指挥，听他舞动胖胖的手臂唱三部合唱的打铁歌。他也挤在人民行列中，看排队向交易公店买盐的情形，又到贫民食堂喝过老弱妇孺们喝的热粥。他到了中华儿童新村，从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一直看到正在设计中的正气大学，走上虎岗的峰峦，远望滔滔的江流。最后，欢迎会上，由幼儿园学生做主人，以歌舞欢笑娱乐嘉宾。最后一个节目，便

是台上台下齐声唱那“两只老虎、两只老虎”的儿歌。福尔门离开赣州那一天，他说：“从这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远景！”

蒋氏的新赣南，大体说来，就是这么一个轮廓。中华儿童新村代表他的百年大计，他说：“三十年后的青年，才是新赣南的真正细胞。”他了解穷人在社会的地位，把无业游民教养起来，才是安定社会秩序的真正力量。一个睡过水门汀的人，才晓得“无衣无食”的穷朋友们的辛酸与向上心理。进入新赣南建设第一步，他确乎肃清了匪祸、鸦片、赌博、娼妓，把旧的赣南付之东流。他的禁赌，是件震动东南的大事，有如商鞅变法，徙木立信，不管豪门巨户，不问皇亲国戚，谁犯了禁便与庶民同科。一位盐务管理局局长的太太，一位专署高级僚属的夫人，新正打牌，便穿了红背心，在公园阵亡将士面前跪了三天，还连续做了六个月的苦工，那么娇嫩的太太，就让草杆磨出了无数条血痕。对于这件事，舆论评价不一。蒋氏本意，或者借此当作令出惟行的榜样。其始，还有些省方和中央机关，听之藐藐。门前站了岗位，庭中牌声如故。蒋氏便公开声言：在法律面前，一律平等，谁敢打牌的话，岗兵立地枪决，主管立即扣押。那些听之藐藐的，也就闻风自危，不敢再犯了。

这样消极性的严刑峻法，行之年余，赣南风气大变，这是他第一步大成功。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夏间，他才抬出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来。他提出了五大目标：“人人有屋住，人人有书读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饭吃。”积极建设当然没有消极管制那么容易，可是蒋氏的声誉远驰中外，给国内青年以无上的鼓励，许多到赣南去，带着去麦加朝圣那么热情。有一位梅县青年，他仅仅带了一套夹衣，徒步到赣州来。他一路幻想，以为到了赣州，便不愁没有工做，没有书读，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，没有屋住了。这位青年，当然会十

分失望的，他后来甚至发出怨言了。蒋氏却坦然说，不能对这样天真的幻想负责。“没有耕耘，哪有收获”？“不劳而获，便是罪恶”！后来，泰和人士也用类似的话来嘲笑赣南：“两个‘人’，一个‘有’。”蒋氏听了大笑道：“两个‘人’，一个‘有’，已经不错了。你看，这个世界，多多少少‘人’之中，才会有一个‘有’？”

在他的三年计划中，“救济”那一章（第十章）最富有兴趣，他要各县设救济院、强民工厂、义童教养、贫儿教养院、保育院、平民村、妇女工厂，这是多么周密的社会政策。他要建立乡镇救济制度，“所有老弱残废鳏寡孤独，伤病妇孺无所归宿者有所安置”。那时候，他提出了四个要求：①大众化：“只有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，才会得到大众帮助，获得圆满成功。”②经济化：“只有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，才会不怕钱少，而能创办广大的事业。”③具体化：“只有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时间支配适当，才可减少困难，彻底实行。”④行动化：“只有组织周密，干部健全，贯彻力行精神，才可确保三年计划实现。”——这些话，代表了他的明朗的政治作风，他和旧官僚绝不相同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。只有他，敢明朗地喊出“社会革命”的口号，不怕戴什么帽子。

六 新中国的梦

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，第四区县长会议开会，蒋氏开头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。他说的是民国六十年的赣南，那时候：

在赣县的一个医院，一位医学博士，很兴奋地对睡在床上的一位姓杨的病人说：“我的工作已经完了。好朋友，你的眼睛现在可以睁开来看见东西了，你的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了。”

那时候，病人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，觉得很奇怪，于是问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青年回答说：“这是赣县医学研究所的附属医院。”

那个姓杨的老人，依然不很明白。他又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的儿子，现在在艺术学院当院长。”

那时，老人更觉得糊涂了。

于是他的儿子就开始解释给他听：“三十年前，我们从九江逃难到赣县来，大概父亲还记得，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那天，日本飞机轰炸赣县，当时父亲的眼睛炸瞎了，耳朵震聋了。从此我们就过着很悲惨的生活。后来母亲还教养了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不久母亲就去世了。”

“现在你的弟弟呢？”老人又问。

“大弟弟在南康防空学校当校长，二弟弟在南京百货公司当经理，妹妹在电车管理处当副处长。”

“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”

“现在科学进步了，我请医学博士给你开刀，使你能够看得见东西，听得到声音！”

“真的，我现在重见天日了！”老人说过以后，就慢慢的从床上起来，走到窗边去向外看了一下之后，问他的儿子：“这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是第九层楼。”

“为什么赣县城里人和房屋这样少？”

“这里是医院学校区。”

“人都住在乡下去了吗？”

“现在我们已经不分什么乡间和城市了，我们只有住宅区、医院

学校区、工厂区、商业区。”

正在讲话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姓王名一明的男子，那时，他的大儿子立刻给他父亲介绍：“王先生，三十年以前曾在保育院读书，现在是崇义炼钢厂的厂长。”

那时，老人说：“那么是你的同学？”

他的大儿子回答说：“也可以说是的，不过我们现在的称呼，不叫同学，也不叫同事或同志，而叫同心。”

“我们的家住在哪里呢？”老人又问他的儿子。

“住在寻邬。”（赣南所属之一县）

“不是很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到那里去，飞机只要八分钟，电车五小时，汽车二小时就可以到。”

这时，赣南市政管理处的处长，拿了一束鲜花来给他们。那位处长，从前是贫儿教养院的学生。

“现在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走走吗？”老人问他的儿子。

“爸爸，你不必走，这是自动椅子，你坐着它自会走下楼去的。”果然，他们坐了椅子，便直驶往大门口。在大门口的墙上，有从一到二百的二百个号码，他的儿子用手掀了那第五号，即刻来了一辆第五号汽车，于是他们就坐上汽车开出医院，在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上行驶。

那时，蒋氏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他所建设的新赣南已在他的眼前出现了，而他所培植的从保育院贫儿教养院出来的苦孩子，也都有所建树，成为新一代的干部了，他所建设的新赣南，乃是一个现代化、工业化、科学化的世界。

那时的赣州，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，而且警察也没有了，